

兩岸對話：

同志運動組織發展的現況與展望

時間：2007年10月25日(四)下午 2:00-4:00

地點：中央大學文學院 C2-211

主辦：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主持：中壢 中央大學何春蕤

引言：北京 愛知行研究所 趙珂

北京 青年同志作家、北京同性戀電影節組委會 范坡坡

上海 女愛女同志工作組、花開女同志網站 想起

成都 愛白成都青年同志活動中心 雷剛

台北 同志諮詢熱線協會 喀飛

台北 性別人權協會 王蘋

台北 晶晶書庫 賴正哲

中壢 中大性／別研究室 丁乃非、黃道明、甯應斌

何春蕤：謝謝大家來參加今天這場難得的座談。過去我在任何座談上的發言或主持都會自己準備講稿，不過今天我決定抄襲另外一個人在網路上已經寫好了的發言，我覺得他寫得很好，所以決定採用來作引言。這個人就是坐在我右邊的同志諮詢熱線理事長喀飛，他在網路上寫著：

「大陸同志運動圈在這兩年很有計畫地到台灣來和本地的同志社團交流，每次來的都是同志運動各領域的重要組織者，每年來的朋友都不一樣，今年本來有 10 位朋友想來參加同志遊行，但是因為政府緊縮大陸人士來台，移民署的入境許可遲遲無法下來，經過各路奔走，發動各種人情、壓力、關說，經過冗長的行政程序，終於他們來了，可是從原來的 10 位減為 5 位，而且是在星期六的深夜抵台，只趕上了最後一天同玩節的活動，這就是我們政府兩岸交流的誠意。各位看到今天台上的情形，可以注意到我們隔岸來的朋友都很年輕、精力旺盛，對各種同志相關議題愛滋和機構組織都充滿強烈好奇心與學習的動力。過去 5 年，大陸的同志運動以飛奔的速度消化、融合，令同為華人背景的台灣驚艷，發展的速度和人才的出口非常驚人，在他們身上可看到大陸在未來 5 年的同志運動絕對是精彩可期的。當然，在認識與對話的過程中，我們同時看到台灣同志運動的某些停滯與緩慢，值得反省。」

以上喀飛這段話相當有意思，從前似乎是大陸的同志向我們學習搞運動，但現在他們卻是站在同等的位置和我們真正互相交流學習。今天座談的與會人士是兩岸三地同志運動的佼佼者和理論生產者的大匯集，每一位都是功業彪炳，所以我們特別準備了簡單的介紹，請看各位手上資料的第 2 頁，上面還提供了每個單位的網站，如果有興趣，請參考，我就不多介

紹。座談時間不多，我們今天安排了 10 位引言，陣容龐大，希望每人發言時間不要超過 10 分鐘，我會嚴格執行管理時間的工作，也希望大家不必客氣，直接講重點，能夠用最簡單最直接的方式講清楚，就能在最短的時間做最有效的互動。

王 蘋：我幫何老師補充一點，在第 2 頁的介紹上有一位是多多，他正在趕來的路上。另外還漏植了一位，就是晶晶書庫的負責人賴正哲，他也是功業彪炳的一位。

何春蕤：好，謝謝。我們先請北京愛知行研究所的趙珂發言。

趙 珂：首先簡短地向何老師和中央大學表示感謝，對同玩節和同志遊行表示致敬，然後先介紹一下我自己。我叫趙珂，工作的單位是北京愛知行研究所，我工作了兩年，北京愛知行研究所最早從 1994 年愛知行運動的一個項目發展而來，最初關注的議題是性別和同性戀，是大陸最早接觸同性戀議題的組織。到了 2003 年，愛知行運動的一位主要人物創辦了「愛知行研究所」，主要關注愛滋病這個領域，但性別與同性戀也是持續關注的重點。今年組織結構又有了新的發展，進行有限責任公司的註冊，名稱為「北京知愛行諮詢股份公司」，因為政府不允許以研究所的名稱註冊，愛知行這個名字也被人占住了，只好想出新的名稱「知愛行」，但因為大家對愛知行都相當熟悉，所以在處理對外事務時仍沿用這個名稱，報帳時才會使用新的名字。

下面簡介我們主要的項目，主要分為政策、教育、法律三大項目。政策和法律為倡導項目，教育則為服務性的。政策項目的主要工作包括：研究相關弱勢群體在政治和法律上所面臨的處境、定期撰寫報告倡導弱勢聲音、國際層面的交流，另外我們有辦一本雜誌叫《愛滋病觀察》，讓全國各地底層的愛滋病患者有發聲的窗口。另一部份是支持中國其他省分的愛滋、同志組織發展，這塊的支持工作也歸在政策項目下。法律項目方面有一位專職的律師和全職的工作人員，我們有一條愛滋病的法律諮詢熱線，同時也是同志法律諮詢熱線，在同志、愛滋領域有任何相關的法律問題都可諮詢。另外也提供相關弱勢群體法律上的援助，每年也會出版法律、人權方面的報告。另外成立全國輸血感染者權利促進委員會，在中國大陸很多人因為輸血或賣血而感染愛滋病，這些輸血的感染者會認為自己是受害者，需要政府賠償，經常會需要和法院打官司，因此我們在各地有一個代表，集中處理這些事情。

教育項目是服務性的項目，在教育項目之下有同志、流動人口、打工子弟、性工作者等項目，主要在愛滋病與人權相關的方面作教育的工作，包括培訓、外展、發放安全套。我們透過教育項目接觸這些群體，發現他們的問題之後用政策和法律項目來支持，這是現在的脈絡。但在今年年底組織結構可能有新的變化，以往的分法在服務和倡導上劃分得相當清楚，但每個團體所面臨的問題都不一樣，教育項目會擴大，變得不夠專，因此會變成 4 個項目，健康項目則涵蓋了同志的外展教育和文化推廣。我們機構現有 17 名正職人員，這就是現在大致的情況。

何春蕤：我幾乎每天都會在 EMAIL 中收到愛知行研究所的信件，他們有各式各樣的行動，像是建議立法、維護愛滋者權益。在台灣做同志運動或跟愛

滋感染者相關的運動，最慘的下場就是沒人理你；可是在大陸就會有人理你，因為可能會和國家形象產生某種衝突。台灣因為地方太小，人家也不用你，所以我們比較不容易因為搞運動而怎樣怎樣，但是在中國狀況是有點不太一樣，所以像愛知行的萬延海這些甘冒不諱推動人權相關議題的人，在中國大陸是相當不容易的。下面我們請范坡坡引言。

范坡坡：我先自我介紹一下，我畢業於北京電影學院，學過電影理論和創作編劇。我當時考電影學院的時候是先看到蔡明亮的電影，你們可能想像不到在江蘇小鎮的一個學生，在看完電影後希望從事跟蔡明亮同樣的事業，所以這是讓我覺得台北很親切的一個地方。我參與的主要是北京的同性戀電影節，還有同性戀影像的推廣和創作的協助。

第一屆同性戀電影節是 2001 年在北京大學完成的，那時我還沒上北京，還在讀高中，那時是由我們一位老師崔子恩主辦，他算是在北京非常早出櫃的人，因為在北大做了一些其他放映的展出，他就跟北京影視協會在一次偶然的談話中說要不然辦個同性戀影展吧，這兩位影視協會的人也就真的把這事做起來了。當時放映的影片包括「東風西風」、「男男女女」、和台灣觀眾最熟悉的「藍宇」，導演和演員也到現場和觀眾交流。當時也想不到同性戀電影節會有那麼大的影響，因為好像只是學校社團的內部活動，可是當時同性戀這 3 個字非常引人注意，導致一些思想上相對開放的媒體都來報導，觀眾也第一次能在公開場合看到那樣的電影。因為那時用的標題是「同志電影節」，北大可能把「同志」這兩個字誤解為 comrade，後來才發現原來是同性戀的意思。

2005 年時辦第二屆，包括台灣的「艷光四射歌舞團」都來參加。一開始也是從學校這個入口，跟北京大學的學生合作。第二屆其實比第一屆慘，雖然沒有官方的壓力，但是公民的意識對活動還是有很大的影響，某位放映員因為看了影片之後堅持要我們換場地，後來只好個別發信通知報名的觀眾換到一個較小的地方，擠滿了整個房間把影片放完，之後有表演還有媒體報導。在 2005 年的年底又衝著熱情辦了一次同性戀文化節，希望在文化方面，例如電影、唱歌、舞蹈、攝影、繪畫之類，都有更好的展出。這一屆同性戀文化節的情況更慘，在改了兩次地點、三次時間之後經費吃緊，但也留下一些影響，譬如我們會把學生的作品放到一些其他的場合，像是酒吧裡表演。現在正在籌備的同性戀電影節改名為「中國酷兒電影論壇」，論壇的形式在大陸可能是比較不那麼敏感的字眼。我們籌畫的有大家研究討論的單元，有變裝、女同志等單元，除此之外我們還希望有個運籌帷幄的單元能給想去拍攝的導演尋找演員、籌募資金的平台，因為許多國際電影節都有這樣的平台。

接下來比較是我個人的研究和創作，我在大學時就曾經寫過同性戀電影的論文，其中包括：〈當代同性戀影片的類型化〉，另外在電影理論課上寫的〈從女權角度看電影中的女同性戀角色〉，得到過論文三等獎。當時在寫這篇論文時發現圖書館裡的資料蒐集相當困難，因此希望以後有興趣的人能夠有資料的通路，於是開始著手酷兒影片的收藏。在 2005 年時找到願意出這本書的出版社，2006 年截稿，2007 年出版，銷量還不錯。另外我也感覺到同志的一種「斷背山文化」，因為李安是華人的緣故，斷背山影響也很大，雖然沒有成功在大陸播映，但是不管是同性戀或異性戀都知

道這部影片。很多人以往覺得自己跟同性戀這個詞扯不上邊，但現在都會開玩笑地說「斷背」，所以我覺得電影文化的力量真是不可低估。

我們希望有個平台讓大家自由看電影，所以我們進行一些酷兒影像的收集，這是在中國大陸地區的，我們一共蒐集了 47 部影片。姑且不談影片的水平，其中包含了許多文化現象，比如說有許多影片在表現易裝和反串表演，這些多是異性戀的影像工作者，但他們覺得這些題材特別能接近酷兒話語，因此就去拍。另外有很多學生在拍酷兒題材的影片當作業，因為他們較為年輕，容易接受到同性戀題材，頭腦也比較開放，另外他們也接觸歐美大師的作品，比如看完阿莫多瓦的作品，也覺得自己可以拍部同性戀題材的電影。這樣的處理可以讓他們在眾多的作業中脫穎而出，與別人不同。他們會是中國電影的將來，因為他們成長之後會進入主流電影的拍攝，一但我們政策開放，人才方面是沒有問題的。另外現在大陸有許多同性戀廣播節目，我也參與了其中的「同性戀放輕鬆」，節目採訪一些願意出櫃的同志的故事。

何春蕤：每次辦這種活動，可貴的地方就是要讓大家看到，同志運動要成功不是靠個人，不是靠少數幾個組織，而必須要有更深厚的社會文化基礎，在不同領域中發揮自己的專長，讓文化更豐厚，更深沉，更複雜，對於這個文化的形成有所貢獻。更不用提同志交流、消費的地方，像台灣就有晶晶書庫，做為一個看似是消費事實上卻是聚集點、資訊流通點，這些都使得運動有比較豐富的面貌，不是單單因著某個事件，大家聚集起來喊兩聲就結束，而是還有其他東西可以調養大家的情緒互動和對彼此的認知。下面就來聽聽也是組織者但也讓女同志運動有更豐富內容的「花開網站」的創辦人想起。

想起：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大陸地區主要是上海地區女同志發展的歷程和狀況。花開網站是女同志的網站，是我和女朋友在 2002 年創建的，當時覺得那個年代比較少有女同志的網站，覺得要有一個集合的平台，包含一些女同志的資訊，所以當時就創建了一個很小的網頁。創建網頁之後發現有許多人都跟我們聯絡，就發現 QQ 突然有很多人暴增「我的好友」，突然之間就傳遍。每個階段我們都有一個新的版本，也做了很多活動，網站上的女同志新聞和影片都在慢慢增加，所有大陸女同志只要連接到我的網站就可以看到這些影片。當時這些資料是非常少的，只有網路能夠蒐索得到，我們就把它集合起來，創立了第一個女同志網路電台，希望透過聲音讓大家了解女同志的資訊和生活狀態。另一個比較有特色的就是我們設計了女同志的 T-shirt、飾品之類的東西，一些以女同志為主題的東西，但這部份會比較少一些。其實在 1997 年到 2000 年間就已經有一些女同志網站，但我想花開網站有一定的影響力。

現在我想介紹女同志的工作小組，1994 年開始就有許多女同志出來做女同志的活動，但總是一個階段一個階段消沉了，或沒有很持續的影響，沒有持續發展的力量。到 2005 年有一個女同志小嫻從美國回來，回到北京後創辦同女的女同志工作組，聯絡大陸各地的女同志，支持各地的女同志發展各地的女同志工作組，現在在上海、成都、雲南、廣西都有女同志的小組，工作包含支持小組進行女同志的活動和項目。在北京召開大陸地區女同志工作會議，也在上海成立女愛工作小組，我們有女同志熱線接聽的服

務，每周會開通一個晚上的熱線接聽，還有主題沙龍、講座、社區的團體活動。今年較重要的是女同志口述歷史的項目——上海地區女同志的口述歷史，希望透過口述採訪歷史的收集，能夠還原長久以來上海地區女同志生活的面貌。這次來台的還有另外一位北京的女同志沒有來到現場，我希望分享一下她在做的事情。她在北京辦了一本女同志雜誌，在 2005 年 12 月創刊時只是一張很大的平面的紙摺起來而已，但是現在已經做得相當精彩，因為她們有許多本來就是編輯和雜誌社的人員一起從事，做的內容大家可到網上搜索一下。

何春蕤：引用喀飛的話說，「大陸同志運動精彩可期」，現在已經看出端倪，各地的同志運動都有具體扎根的動作。一般說來，我們較常遇到上海和北京來的朋友，而且以北京為大宗，今天我們有內地成都來的雷剛先生。

雷 剛：我想從個人的經驗講起。2002 年的時候我知道愛滋病在中國大陸的猖獗，以我同志的身分希望盡一份力量，讓周圍的朋友不會受到愛滋病更多的影響，2003 年開始加入同志社群愛滋病防治工作。隨著國際資金的進入，大陸各地都有疾病防治中心的系統推動愛滋病防治工作，我也是藉由這個入口開始相關志願工作。但是做得越久，就越覺得愛滋病不應該也不可能是一個單一的問題。如果只靠發安全套、做篩檢就能解決問題，那不可能在這幾年在同志社群有那麼大的影響，在其他族群中也造成很大的影響。當時也跟男朋友商量，思考在這種情況下該怎麼解決愛滋病問題，另外我們也覺得愛滋和同志污名的問題光靠各地的小組是不夠的，但是人從哪裡來？我們可以做些甚麼？2005 年開始有了這樣的想法，後來跟成員交談後，發現彼此相當能夠碰撞出火花來，就打算在成都做試驗性的項目，試驗公民社會在同志社群、在成都是否可能推動，是否能夠找到途徑發現、培育未來人才。

從一開始的愛滋病防治活動，後來發現有兩項很重要的事情要做。第一是不斷地讓跟成都中心接觸的年輕同志從現在開始就能有一些影響，10 年之後成為社會棟樑時會因為今天接觸到的內容而回過來回饋同志社群；第二是我們覺得除了愛滋病的小組之外，還需要培育出更多其他類型的小組，我們會刻意培育女同的小組。大陸很奇怪，全世界都是女同很強，可是大陸女同志的組織化一直很有問題，所以我們也希望做這方面的嘗試。這些方面都還在做，但跟北京愛知行的區別很大，北京愛知行一直以來都在支持全國各地的組織，而我們做為成都地區的同志行動，這些都在我們的計畫當中，正一步步執行。

接下來簡單介紹成都中心的活動。因為剛開始不知道怎麼將理論框架的東西落實到實際的活動上，只能靠試，在各種活動中看反應，看大家參與程度。最早會請大家來聽講座，可是發現效果並不是很好，所以後來會用比較娛樂的形式，和比較能確實幫助到願意來中心服務的這些人的生活。比方說自我認同的部分，我們會辦一些伴侶的論壇講座，還有電影觀摩的活動，和一些團體治療的活動，透過這些內容讓年輕的同志能夠達成更好的自我認同。另外還做心理諮詢員的培訓，主要目標是青少年，所以會把觸角放在大學，大學這個入口在成都或是大陸都是很難打開的，我們計畫幫助學校建立心理諮詢網絡做為切入口。另外也透過活動中心傳播科學文化，我們一直都覺得科學讓同志自我認同路上的同路人，看似跟同性戀沒

有關聯的東西其實會幫助許多同志開闊視野，所以我們會辦有關例如恐龍的講座，透過這些多元的東西讓大家看見同性戀的生活不只是每天去找人，夢想找終生伴侶，而讓大家思維逐漸放開，促進同志的經濟文化。

何春蕤：大陸朋友果然都是看著時鐘講話的，時間掌握得很好。我們接下來看看海峽這邊的朋友發言是否有自我克制的能力。我們今天請來的本地運動者也是功業彪炳，同志諮詢熱線的創黨元老、當年的創始人物有兩位大頭都在這裡，都是資深到不能再資深的組織者。先請喀飛來說說。

喀飛：我每天都跟雷剛吃宵夜，搞到很晚，聊的過程相當有趣，你會發現在台灣的同志運動裡，大家會很積極地想參與很多事情，熱心關注很多議題，可是最大的差別在於——很少人能那麼認真來談組織這件事情。組織這件事情相當重要，它怎麼樣讓運動更長遠，崛起的影響力更大，在台灣的運動很少有機會做這樣的反省和思考，但大陸的朋友給我的感受非常強烈，不管是他們背後的組織機構或是他們個人，在訪談或聊的過程中可以很快很精準地去談到如何學習組織背後運作的方式和組織核心的東西。如果不是對組織運作非常有意識的人，真的不容易做到，特別是他們年紀那麼輕，從 22 歲到 25 歲到 33 歲，我的感受是非常強烈的。

為什麼今天是我和王蘋坐在這裡，而不是更年輕的人坐在這裡？我覺得這是台灣運動的一個危機吧。我大概談一下同志諮詢熱線發展的過程，其實和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有很大的關係。前幾天還發現一個歷史事件，1998 年 3 月 8 號在清華大學月涵堂辦的一個「八卦桃花三八狂歡」的活動，那天活動之後和王蘋聚餐時討論到同志諮詢這個話題，那時討論的內容幾乎就是同志諮詢熱線誕生最原始的念頭，希望用機構化的東西讓求助的人能夠得到一些幫助，讓這些在長大的小朋友不要像我們以前一樣很痛苦地經歷摸索的歷程，因此就快速地密集開會討論。1998 年的 6 月舉辦過一次募款晚會之後，同志諮詢熱線正式在第二天成立，成立的過程其實有點有趣，在我以前參與過的活動當中，比如說 1995 年參與 GLAD 的活動，當時我只是一個去參加活動的人，包括當時認識《同性戀邦聯》寫書的那幾個 GAYCHAT 成員，一直到 1996 年參與製作台北電台「台北同話」，那個節目對我來講，雖然時間很短暫，可是透過節目認識的一群朋友幾乎是我之後做同志運動中人際關係輻射出去最大的動力來源。

熱線成立是由 4 個已經存在的團體共同成立起來的，一個是 QC，就是王蘋她們的團體，另外一個是教師同盟，再來是同志助人者協會，第 4 個是同志公民行動陣線。同志公民行動陣線其實是在 1996 年底跨社團活動裡由 2、30 個社團共同成立，活動雖然後來沒有辦成，但網絡和延伸的人際關係一直都在，1997 年的 6 月辦過一個彩虹同志夢公園在新公園，一個白天公開的活動，當年的 8 月常德街事件發生之後也舉辦了座談會，這就視同陣。教師同盟和同助會的創辦人也是台北同話製作群的眷屬，所以台北同話輻射出很多，也透過那個活動認識了王蘋和很多 lesbian。我覺得自己非常幸運，在參與活動很早身邊就有很多 lesbian 的朋友，也讓後來熱線一直都是男同志和女同志一起工作的場域。1998 年熱線成立變成組織化的機構，跟以前最大的不同就是以前完全就是社運的樣貌，很像打帶跑，你為了一個活動就趕快找一支電話線讓記者可以找到，以一種奇怪的方式和外界或媒體有種聯繫。機構組織化後，有固定的辦公室、工作人員，需要固

定的資金，這是台灣同志運動第一次組織化、成為固定機構的開始，就是在 1998 年。

同志諮詢熱線有幾個基本的理念影響了後來的發展。一個是同志同儕輔導。在電話線上諮詢服務的義工，和打電話來的人有著相同的生命經驗，其實這個生命經驗就能解決求助者大部分的處境。求助者不見得有很大的問題，只是他們不相信或沒有機會聽到或看到世界上有跟他一樣的同性戀存在。很多人在早期打電話進來聽到聲音時非常激動，會問「你真的是同志嗎？」然後在電話線上沉默、驚愕了很久，這是早年很常發生的經驗，所以同志同儕輔導是熱線很基本的一個精神，也因為這個精神，所以我們在志工訓練的課程中有一半的課（10 堂課）是在講同志歷史、同志文化、同志處境，幾乎都是在講同志本身是甚麼，他的環境和遭遇的狀況，另外一半才是在做諮商技巧、助人技巧和同理心的訓練。這樣的訓練讓熱線後來一直都是兩條路線齊頭並進，一條是社會運動，另一條是社會服務。我常會開玩笑說，同志諮詢熱線是同志社群裡的張老師熱線，但是他們是一群會走上街頭的張老師，他們不但想改變電話線上每個個人的處境和狀況，也想改變大環境、結構面的問題，人權法律文化的問題。

另一個理念是同志資源網絡。求助的這些人其實只要能夠確定在他以外有很多同志的存在，建立與社群和同志文化的連結，其實就可以得到很多自我的力量，所以我們每個義工都會有一本很厚的資源本，裡面收集了台灣各地的很多同志空間、同志場所、同志書籍電影。如何讓打電話進來的人和同志資源的網絡連結起來，這是我們基本核心理念。另外一個核心理念是同志社區中心，希望不只影響個人、不只影響政策，也更能連結整個社群。包括在空間的選擇上，同志諮詢熱線一開始就是選擇一個會有比較大的開會空間，還有大教室做培訓這方面的工作。

社區中心的概念也讓同志諮詢熱線和其他同志社團保持緊密的連結。第一屆的募款晚會當時，要怎麼樣去賣 400 張入場券對我們來說是從來沒有過的經驗，於是我們把全台灣所有的同志團體找來開了賣票的說明會，每個人都被分配要賣多少張票。這個模式延用了 10 年，後來熱線晚會從 400 人變到 600 人，變到 800 人、1000 人、1200 人，賣票除了晶晶書庫和女書店之外，到去年增加了拓網網路售票，提供中南部朋友購票的管道，但還是有相當大的比例是透過熱線工作人員擴散出去的人際網絡在賣票。這是熱線重視每個義工、草根的價值的地方。

這在另一件事情上也可看到對照的狀況。2000 年（熱線第三年）我們開始討論要正式立案，在官方有登記註冊，有合法的報帳和辦活動。可是當時有另外一個聲音出現，有另外一群朋友要成立同志協會，成立的朋友也都是熱線的好朋友，包括晶晶書庫的阿哲、許佑生、FUNKY 的二哥。當時討論是否熱線的立案和同志協會可以合併，對我來講，其實對同志協會的朋友都有交情，可是後來熱線內部的決策做了否決。大家意識到這件事情可能的影響，所以很難得地召開了所有義工的大會，畢竟那個決定對熱線後來的決策機制和組織狀況有很大的影響，而熱線重視所有參與做事的義工，他們的聲音對熱線的決策有相當的影響力，這是熱線發展上重要的精神和想法。

2000年6月9號熱線召開成立大會，正式在內政部登記為同志機構。當時我當選理事長，有個理事長證書，我就開玩笑說自己是全國第一個列管的同性戀，領有執照的第一個同性戀。立案之後熱線有更多機會開拓資源和辦活動，包括2000年的台北同玩節，2001年到各地舉辦的教師研習，2003到2006年熱線進入工作組分立的狀況，家庭小組、教育小組、愛滋小組、人權小組、老年同志小組都在這段期間成立。各小組都有很專業的分工劃分，但是造成的影響是大家太關注在小組的事情上，比較缺乏統合的視野，到2007年之後我們感覺到這個危機，開始整合，發展出工作會議的機制，有各組較為資深的成員參與，大概有15到20個人，一起討論關於運動的路線和運動的理念，把事務性的行政工作交給專職的行政人員決定，所以在今年新增了1個工作人員，這大概是熱線發展的簡單過程。

何春蕤：年輕人多半是以熱情取勝，老的薑就是有他生命的沉澱。喀飛第一 year 做理事長的時候我其實在其他場合上聽過他說話，現在聽起來真的很不一樣。第二次回鍋做理事長，他好像有了一個整體的圖像在他眼前，對運動和組織的發展有很清楚的脈絡。下面我們來聽聽另外一個也是很老的薑來談談她對運動的觀察，請王蘋發言。

王 蘋：喀飛已經講了熱線的發展在台灣同運重要的歷史位置和當時的社會脈絡，我自己屬於的團體在2000年之前面貌不太清楚，只算是熱線的一部分，很多工作都是一起做的。目前我們這個團體叫性別人權協會，可是剛才喀飛在介紹時用了一個很有趣的名字叫QC，知道這個名字的人就知道有個歷史脈絡在那裡。QC才真正代表了我們是什麼。

QC最初成立時，成員大多都已參與台灣當時的社會運動，講得更精準是婦女運動。婦女運動和同志運動並不必然有關或沒關，在我們身上卻是渾然一體的，從婦女運動的角度來想，我們是用婦女運動的資源在做同志運動，但是我們的理解不是這樣，我們從不認為我們做的同志運動不叫婦女運動，這就是很大的爭議所在。在資源很有限的時候，我們在內部搞了一些讓某些人不太愉快的狀態，其實我們一直都讓別人不愉快，從來都沒有讓人愉快過，不過那段前歷史太長了，所以略過。我們就直接出來了，我們覺得自己要有清楚的面貌，我們要做什麼運動是由我們自己的嘴來說，由我們自己的身體來打造的，所以我們就成立了一個自己的團體。我們也不知道自己要幹嘛，就想說我們總有些東西跟Queer有關，所以就叫Q；那我們也認為階級運動是社會運動最核心不可少的部分，所以也用了C，就是Class，所以團體就叫做Queer and Class。可是這個名字出來，所有人都不太懂，因為沒有中文，也沒辦法說清楚自己是什麼。

大概有一年的時間我們就是跟熱線一起混，但是我們自己的理念很清楚。由於我們有社會運動的背景，所以我們是帶著社會運動的背景進入一個運動組織發展，而這個運動當時比較狹隘的脈絡是放在同志運動上，這跟當時的組成份子是什麼樣的人直接有關。但是當時很多人不太能把我們叫做同志組織，我們也不覺得自己只是同志組織，但是被叫做同志組織我們也覺得無所謂。渾沌了大概一年半，我們覺得參與熱線也差不多了，該自己成立一個正式立案的團體，那個時候正式立案是一定要做的，因為地下化很難操作。要立案就要有個名字，這個名稱相當關鍵，而我們團體的名稱幾乎就見證了2000年前後當時社會的發展。我們登記的那一年，台灣的

人團法有個改變，就是台灣意識站起來了，過去在登記人團法的時候一定要用中華民國作為名字的一部份，但是就在我們登記的那一個月份有新聞報導，從此可以選擇稱為中華民國或台灣。我不太知道我們是不是第一個登記用台灣的團體，但是我要聲明我們並不是那麼擁護台灣那兩個字，可是當時就覺得能選擇為什麼不選，要做個不一樣的選擇，結果就用了「台灣」開頭。解決前面兩個字沒有爭議，但後面就很麻煩。先講最後面的，你可以叫協會、促進會、什麼什麼會，我們覺得叫「協會」就好，反正最重要的是中間要叫什麼。簡單地說，我們需要一個直接看到就知道我們在搞什麼東西的名稱，而當時在台灣搞人權的工作是個顯學，幾乎一定要講人權才過得了那個關口，既然這樣，我們就一定要有「人權」這兩個字。但是別人談的都是政治人權，譬如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有很多血淚的，我們沒有那麼多的血淚，但也覺得我們跟人權有關，所以關鍵在於是什麼人權。可以很簡單就叫同志，但是我們無法接受，因為我們從婦女運動出來，覺得生理女這個部分不能丟掉，那也是個衝撞的可能性，而且台灣社會還是父權社會，這部份還是要存在名稱上，所以就不能叫台灣女同性戀人權協會，這太狹隘。我們要被看見，但不要被狹隘化，想了半天就想出「性別」兩個字，這個名稱好到什麼程度呢？從此就一帆風順，只要是民間團體的集會，政府部門就會發公文，我們都會在很多脈絡裡自動地出現或收到通知。協會是民間團體，所以發到全國我們就會收到，發到人權團體我們也會收到，發到婦女團體的公文我們都會收到。這個名字取得真是好。

那我們做什麼工作呢？當然就是帶著社會運動的背景進到台灣的民間團體，希望透過組織發展的方式來持續我們的運動發展。例如我們參與愛滋感染者權益促進會時，幾個成員就介入那個組織的發展，也在裡面搞運動，所以有時候在內部開會我們都是講話比較兇的那些人，比如要做決策的時候輪到我發言，我就想，要講話就要講不一樣的話，意思是說我們一直希望在不同的團體裡面還是有往前進的可能性。當然這也包括在熱線開會我們也有比較衝突性的發言，但其實我講話是相當溫和的，雖然有衝突性，但聽起來也還有點悅耳。剛才喀飛有提到，我想補充一下，熱線在發展過程中因為取了諮詢熱線這個名字，著重社會服務，但是參與的人其實都有強烈的參與和打造社會運動的想法。這兩條路線一定有路線之爭，這是不可避免的，我們也不想迴避，在內部討論的時候曾經針對這件事情有過爭論。一個團體本來就有很多不同的聲音，因為團體是眾人所聚集的，而團體在發展的過程裡怎麼樣兼顧理想性的發展，讓打造社會運動的想法不要消失，就只有不斷去做、不斷去講。

團體內部的發聲是我們一直在做的，在團體外部我們自己用團體的名義在台灣社會空間裡進行對台灣各種僵化體制的挑戰也是從來沒有間斷。我們不只在做同志運動，我們希望參與全面打造社會的運動，所以我們參與很多很多運動，我們網站有詳細的介紹。我想回應一兩點，聽到大陸的朋友談到組織發展有些限制，我們很快會想到政治限制，就是大陸沒有組織人民團體的權力，比如說辦同性戀電影節要打帶跑式的換一些場地。我覺得要做一個台灣的回應，台灣在政治上似乎沒有這個限制，你要組織團體有些竅門還是 OK 的，雖然很麻煩。當年台灣同志運動在發展的過程裡比較

不是外界對我們的限制，而是個人的問題，可是這個個人也不是個人的問題，它也是社會問題，就是出櫃的狀態。我們可以辦活動，但你要 10 個人站在這說「我們都是同性戀」會有問題，會有櫃子的問題，所以出櫃的壓力是過去我們談到台灣同志運動發展的重點。比如喀飛談到的歷史年代，比如說彩虹夜總會、同陣辦了很多公開的活動，都要讓媒體宣傳才有其他人看的見，可是出櫃這件事情都會是同志內部討論的重要事。大家辯論出櫃是不是必要，什麼叫出櫃，以什麼方式出櫃，難道我們不能用集體出櫃的方式面對社會，甚至會提到華人社會跟出櫃的特殊關係。出櫃這兩個字變成運動核心的思考，所以才發展出面罩，很美的羽毛面罩，用了好多年。大家可以看到台灣同運確實有改變，現在不會再看到面罩，污名化的過程在社會運動的發展裡已經慢慢被移除了。

另外我想談談將來我們希望可以怎麼做。台灣這種往前衝的運動方式當然要持續進行，可是我們也覺得連結是重要的，包括兩岸三地的連結和亞際的連結。在整個國際發展上，亞洲是個很奇怪的地方，台灣其實看不到很多亞洲國家在旁邊，想到國外都是在很遠的地方，特別是我們的移民署沒有這個眼界，所以現在的工作重點就是希望把我們的眼界打開，把運動者的眼界打開，和很多地方做連結，鄰近國家的經驗怎樣和我們的經驗做交換，怎樣互相衝撞、一起往前。我們會因為大陸朋友的刺激往前，我們也希望自己做為一個前進衝撞的力量，到每個團體裡跟你們吵吵架，讓大家有一起往前的可能，這是我們蠻樂在其中的工作。

何春蕤：我有時候覺得王蘋有另外一個身分，就是代理孕母，常常會生很多小團體，然後到各個小團體裡去幫忙，以便讓運動繼續，有時候會覺得不知道該怎樣定位自己，定位之後還是到處竄。她希望的運動眼界不是很狹隘的，不是說我是同志團體，我只看同志，不是說我是女同志，就只看女同志。在 QC 裡面，至少還需要看到社會位置和壓迫的關係。下面請同志諮詢熱線國際部主任多多發言。

多 多：剛才喀飛把熱線的脈絡講的還蠻清楚，我想講的是台灣熱線和其他同志運動、社群的一些現況，現在有什麼困境，在未來能做些什麼。同志諮詢熱線成立正式立案後，其實是在政府公部門裡取得了發聲的位置，政府就會知道有同性戀相關的議題時，譬如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就必須徵詢你的意見。之前除非它知道你的身分，不然不會找你來參加政策性的討論。隨著同志團體的立案，在政治上的參與逐漸增加，熱線這兩年發展可以看到和其他政治團體或 NGO 團體和一些邊緣團體，比如說性工作者、愛滋感染者團體，不同團體的參與和連結，打開了同志運動的不同面向。在

和不同團體合作時，其實是衝撞它們原本的觀念和想法，同時也開始接觸一些和性不是那麼相關的團體，比如說像台灣人權促進會、司法改革基金會、媒體改造團體、台少盟、勵馨基金會，在性這個議題上似乎非常遙遠，可是透過不同議題的參與，拉近熱線或是同志團體和這些性質迥異的團體之間的距離。這個關係在今年有相當具體的展現，今年就業服務法要訂定一項性傾向反歧視條款，我們就發信給所有社群和所認識的 NGO，希望他們來支持這樣的立法，所以就會在民單上看到同志團體，也看到中央性／別研究室，也會看到日日春、愛滋感染者權益促進會，可是也會看

到台少盟、勵馨基金會。這個名單看過去是個非常詭異的名單，從沒想過這些團體會在同一個議題上做表態支持，在這點上來說，這是台灣同志團體藉由不同議題在政治和社會上的參與，使不同團體看到真的有這樣一群人，這群人的某些價值也許是我們不能認同的，但在某些議題上我們是可以討論、合作、甚至辯論的。我覺得這是目前台灣同志運動在政治和社會上的一個優勢。

這些團體來自社會不同層面，從兒少到人權到法律到其他層面，而這樣的討論和活動看起來非常有成果，可能會促進法案通過或獲得不同團體的聲援，可是再反過來看，同志社群內部卻是處於停頓的狀態。早幾年的連署絕大部分都是同志團體，絕對佔連署名單的一半以上，可是近幾年同志團體參與連署的比例下降快速，不知道是不關心這個議題還是沒接收到訊息。做為一個組織運動者和社會運動者，就該回過頭來想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情，為何同志社群對社會議題的參與逐年快速降低。我們現在做的很多都是對外，反而對內部性別弱勢的關注和紮根是沒有的，這點非常可惜，在未來需要多做些這樣的事情。

另一方面，相較於 10 年前，台灣社會對於同志的資源其實是增加了。當你想向下紮根時就會想要進校園，以前資源缺乏的時候，你會覺得很積極，這個也想要，那個也想要，但對於現在的學生來說，他可以在網路上認識很多不同的朋友、很多不同族群的人，他就會覺得他的生活是 OK 的，他不需要為了目前還看不到的權益去做奮鬥。我覺得我們應該去強調，雖然你看起來是過著不錯的生活，但這個生活卻不是那麼真實的，在真實的生活中還是可以看到很多小朋友被欺負，或在家裡還是無法面對出櫃，或在工作上還有很多狀況，這些狀況難道不是反映個人在權益和生活上的那些東西嗎？該如何把生活和權益放在一起，這是我們該思考如何教育大眾的地方。

資源的增加也不是件完全不好的事情。透過網路的社群有很多不同的團體出現，像是水男孩或拉媽，都透過網路或電子報做強烈的連結，像拉媽除了網路以外也透過實體的聚會把她們想講的東西清楚地表達。我特別想講的是水男孩這個很特別的團體，它一開始是一群愛好游泳的人聚在一起，隨著帶領者的運動意識不同，團體的運動走向也受影響，變成不單單只是游泳同好會，在遊行的過程中甚至發展出「我們應該要接受感染者」的說法，去年就製作了小貼紙請大家要接受感染者。它不再是一個純粹的網路家族型態，而開始把運動的東西往裡放，也開始感染到團體中的其他人。或許有些人對於感染者不了解，大家會因此開始思考為什麼我們團體要做這樣的事情，在團體裡也一定會有不同的討論。這樣的狀況也發生在許多其他網路的家族和社群，台灣同志運動因此開始有些新的樣貌和動能出現。

對內的教育非常重要，可是這樣的教育要透過什麼方式呈現？要怎麼吸引人來到這裡？如果每次都辦座談，一定沒有人要來，大概辦了一季就會關門大吉。我知道國外有些團體，不知道台灣未來有沒有可能做到那樣，類似社區中心的概念或模式，在 community center 裡面也許不只是教你遺囑要怎麼寫和一些理財方面的資訊，而也可以上些同志瑜珈課，就是各式各樣的活動，對於現代人求新求變的狀況才更有可能符合需求。同樣，如果

水男孩的那種模式是可以運作的，在那樣的活動裡面，雖然看起來跟同志運動沒什麼相關，但是可不可能在活動中把一些東西帶進去給來參加的成員，這也許是一條路。

對於國際連結的部分，我因為要出國了，所以被冠上國際部主任，我會努力做國際連結的事情。這幾次出去和不同國家的人接觸，那種感受非常不一樣，台灣同志運動有一個幸運的地方，是因為台灣的社會脈絡可以很單純從同志運動做出發，直接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的議題。但在很多亞洲其他國家，都要透過迂迴的方式，特別早年都透過愛滋的防治偷渡跟同志相關的議題，包括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都是這樣的狀況。去年大陸朋友來的時候聽起來也有點像是這樣的狀況，因為不能很明白地說要做同志運動，只能用轉換的方式。可是就像侏儸紀公園裡非常有名的一句話，「生命會找到它自己的出路」，其實各地的組織工作者都很努力地用直接或間接的方式做想做的事情，試圖去衝撞或打開這個社會的邊界，衝出邊圍。我覺得在未來在亞洲或兩岸三地真得可以有多一點交流，大家面授機宜，討論如何在彼此的社會裡一起衝撞。

何春蕤：有困境當然也有新的發展。我把阿哲放在最後，其實是有很特殊的想法。我覺得運動組織者雖然很努力地在做各式各樣衝撞的工作，不過阿哲是第一位因為各位的言論自由和資訊自由而被判刑的。各位不要小看這件事情，他以後申請出國，良民證不知道會不會下來，在他的證件上永遠都會有這個人曾經觸犯刑法 235 條散播猥褻、妨害風化的記錄，這不是一件小事。我們曾經走過司法體系的人都知道那是個烙印，就算你釋懷，可是在文書上是留著的，會有什麼可能的影響，是大家要跟他一起去承擔這個後果。對於在台灣保存和抗爭言論自由，政治領域裡面有很多人現在已經收割果實，也都做上官了，但是另外一些人像阿哲，為了各位的言論自由打了 4 年整整的仗，現在也只能吞下大法官 617 號釋憲文繼續過下去，所以這部分在同志抗爭來講、就同志肯定自己的生活空間上是有可歌可泣的重要性，希望未來寫同志史的不忘記這一頁。現在就聽聽阿哲。

賴正哲：我大概沒有這種經驗還沒講我就想要哭。我覺得我的書店跟各位有非常大的不同，我既要搞商業又要搞運動，所以我搞得很累，因為我並不是一個很想要賺錢或很會賺錢的人，可是我的書店又非要賺錢不可，不然會步上女書店的後塵，所以我就必須很努力地賺錢又很努力地運動。因為必須賺錢，所以要賣更多的情色雜誌、更多淫穢書刊，到最後打上官司，沒辦法賺錢，但運動的另外一面也跑出來，並不是因為你打上官司書籍被查扣被判了刑，從此之後書店就要關門，案發後我收到很多鮮花、簡訊、MSN 不斷地關心我，因此店裡的生意也就強強滾，一路翻紅，原來運動和商業也可以巧妙地結合。就覺得蠻開心的，至少在操作上面還蠻愉快的。

打了 4 年的官司，大概不是人過的生活，中間發生了一件我一直無法釋懷的事情，就是我母親在官司的過程中往生。其實在開設書店的一開始，母親就是我相當大的支持力量，因為我覺得我去作運動拋頭露面 OK，但我的家人必須承擔很大的後果，更何況我母親在那時身體健康已經很不好，所以那時候每次我從法院出來，都希望母親可以和律師講一下話，讓我母親吃定心丸。可惜官司還沒結束，在一審的前一天 5 月 30 號，我母親走了，5 月 31 號在同運夥伴陪伴下我在基隆法院聽到噩耗，雙重打擊，我敗

訴了，一年後二審又敗訴。歷史總是有巧妙的安排，何老師人獸交網頁的事件也在同年發生，我就很焦慮，何老師那麼忙，光要打官司就沒有時間聲援別人，可是我每次出庭，何老師甯老師丁老師還有其他同運的朋友永遠陪在我身邊，不管是在台北或基隆。如果人生能夠因為這樣子有這麼精彩的一段路程，那大概也夠了。最近有一位比較年長的同志往生，我其實是很樂觀地覺得，如果我再過幾年就要死了，至少是沒有白活。講這些東西是有點煽情，但還蠻有鼓勵自己的效果。感謝歷史巧妙的安排，讓我在過程中是有陪伴的。

我想回到晶晶作商業和運動的部分。昨天趙珂、坡坡和雷剛住在我家，我昨天和熱線的智偉去宜蘭的一所學校演講，講到轟趴，趙珂和坡坡就問我什麼叫轟趴。轟趴是台灣男同志很特殊的文化，很多男同志會聚集在一個公寓或大樓裡頭開 party，在裡面用藥、發生性行為。2004 年農曆年前，警察去臨檢轟趴，在被抓到 94 位參加轟趴的朋友裡驗出來有 28 人感染愛滋帶原，後來轟趴就和愛滋嗑藥劃上等號。剛才我們一路走來跟大陸的朋友介紹台北有哪些重要地景，一個就是我曾經研究過的二二八公園，我就突然想到，不管是二二八公園還是轟趴，就好像在打土撥鼠，跑出一個來就被打扁，包括晶晶也是，想盡辦法把它打下去。經營晶晶的時候就有這樣的困難。

我那時候研究所剛畢業，一直想這個書店一定做不起來，一定會倒，但我做好玩就好，花個錢圓夢，那時就想，早點去做，還年輕，還可以賺錢還債，所以就開了晶晶書庫。那時已經有很明顯的想法，這個書店一定會引起媒體注意，因為台灣的媒體非常多，它們需要 24 小時都有新聞不斷地播出，所以那時在取名字上面就特別要讓它有些意義，它既是男性精液的精，也是女性月經的經，可以是讓異性戀心驚膽跳的驚，也可以是賺了很多錢的金。我就覺得這個名字取得真好，一開張就很響亮、琅琅上口。開了之後就發現狀況立刻來了，在營業的第一天晚上，正準備打烊，警察就來了。現在回想那個過程，就像是現在在講轟趴或健身房事件那種緊張和害怕，到現在都沒有辦法消除。到現在鄰居還是會檢舉我們，用各式各樣的名義打壓我們，如果有天各位到我們店裡看到招牌不見了也不用訝異，那是我們鄰居用盡各種方法要把我們的招牌拆卸下來。

很累的一點是既要做運動又要賺錢，但是至少我可以在這個過程中匍匐前進。作為一個書店，絕對不能太靜態，也不能太保守，要有各式各樣的話題、活動、座談，不斷地在操作，這是在誠品書店身上看到的特質。女書店也給我很大的刺激，它作為一個主題書店所呈現出來的樣貌。所以我大概是融合了誠品和女書店的特色，把晶晶開出來，剛開始還不錯，對面馬上又開了咖啡館和藝廊，當然那時候比較希望打造一個同志社區。開店前我曾到舊金山的卡斯楚街觀摩，回來之後希望能有一些具體的實體空間出現。後來就出現幾個問題，第一，現在的學生都不太喜歡看書，來買書的人都會殺價，說你們沒有賣得比博客來低，我們去博客來買就好了，或者覺得去 7-11 領書很方便，我們就覺得壓力非常大。

在商業上我幾乎是被逼到非常窄的縫，不知道該如何走下去。各位或許不曉得，書的進書成本非常恐怖，是七到七五成，再開個發票、刷個卡，將近八成，然後還要請店員、用設備，不但不容易有利潤，還有點入不敷

出。後來發展出一個方法，要員工像百貨公司賣面膜家順便推銷面霜的售貨小姐一樣，如果各位買了一本《同志研究》，員工要追問是不是也要買本《藍調石牆 T》，也就是想辦法讓客人提一袋書出去。可是又怕客人不高興，覺得根本在強迫他，所以就嘗試了很久，至少掌握某些極限，讓客人覺得比較舒服的方式。

還有件事情和運動有些關聯。之前去女書店，我發現居然沒有男性的員工，我問過女書店的朋友為什麼不用男性或跨性別的朋友，她們就說還是希望能夠照顧生理女，以她們為主。我那時就想，我一定要找一堆人跟我一起經營書店，所以我開放徵才的條件，一定要有異性戀、男同志、愛滋感染者、雙性戀，還有一些其實不是同志但是身體上弱勢的聾啞朋友。書店作為一個運動的門面，記者就跑到書店把麥克風放在我嘴邊要我講話，有些事情我都還沒沉澱過，實在很難回答，我也考慮到有些事情不用我來回答會比較好，比方我可以請我同志員工來回答、請我異性戀媽媽來回答都會比較好，所以在商業的操作上，我特地擺放這些人、安插這些位置，這樣不會說來說去都是我在講。所以在面對媒體上，我的員工幫了我非常大的忙。

再來就是跟社區的關係有點緊張。剛開始的時候，鄰居覺得我只是一家小小安安静静烏漆抹黑的店開在那裡，沒想到我是用大片玻璃，又在媒體上放話，他們就覺得有些壓力，彼此的拉扯就出現。他們其實有到書店做一些不禮貌的動作，而且我附近教會林立，被天主教和基督教教會包圍，他們來的時候就說，這個社區就是因為你這個書店讓社區品質變得非常差，房價也直直落，我們希望你不要再把這些東西掛出來，就安安静静開你的書店就好。我心裡就想，你憑什麼這樣跟我說話？你是誰？後來我也發現台灣房地產很好笑的一面，我沒想到我選到的是一個金雞母的位置，鄰近公館，前面是台電大樓，後面是三軍總醫院，左右有台大和師大左右護法，讓書店的房價拼命地漲。後來陳水扁的女兒陳幸妤進住附近，我就跟鄰居講，總統的女兒都住進來，怎麼會房價不好？我覺得在商業和運動上之所以那麼辛苦，是因為至少在台灣，還沒有看到成功的模範。在內部也有一些爭執，有些朋友說我花太多時間在做運動，但我跟他們說，如果不做運動，那這家書店其實可以不用開了，因為本來的目的就是希望有個運動性的空間在這裡，不做運動的話怎麼辦？反正跟股東之間就有很多內部的拉扯。

最後要講一個比較好玩的事情。我母親往生那天，要佈置靈堂舉行告別式，因為我爸爸非常愛面子，所以都他交往了很多社交名流，包括市議員、立法委員、市長、和很多民意代表都送來輓聯。前一晚我就跟我爸爸說，我這邊有一個中央性／別研究室何老師送來的輓聯，希望能掛在靈堂上。那時我就想，我老爸一定會反對，因為上面寫著同志之母。我就跟爸爸說，何老師送的輓聯一定要放在靈堂的最前面，後來我爸爸也真的很疼我，就把輓聯掛在最前面。那天也就有很多人在竊竊私語，說這個輓聯是誰送的。我想空間就是那麼微妙，如果生者的空間那麼父權，難道連往生者的空間也要那麼父權嗎？非常謝謝同運的朋友還有何老師陪我走過這段路。

何春蕤：校外人士的引言非常精彩，不過因為時間已經拖得比較久，我們請中央性／別研究室的三位老師酌量講重點就好。不要講太多理論。

丁乃非：我想講的是運動影響到我想研究和探討的一些議題，主要有兩個面向，一個是台灣女性主義性政治，我也是從王蘋剛剛講的那個婦運脈絡出來的，可是後來覺得很有必要去思考台灣婦女運動走的是很特殊的路，內部也有一些很特殊的爭執，也許有很類似的，但因為社會和文化的不同，所以這個部分其實是需要思考的，就是女性主義和婦女運動論述當中的性政治，尤其跟性工作、性污名相關的。另外，我們有三位朋友一起研究從從 1970、1980 年代到 1990 年代女同志的文化文本，以便了解台灣一些特定的歧視女同志或同志的方式，包括凡是跟性相關的就非常不能接受，但是如果你是同志，可是又能跟性保持一點距離，那就可以有條件地接受你，可是如果你不保持距離，那就是個問題。另外一個面向就是家務勞動和卑賤性的關連。

何春蕤：喀飛剛才一直說要看到後起之秀，我們性／別研究室也有後起之秀，我們現在請黃道明，性／別研究室最年輕的成員。

黃道明：我接受的性別知識和性／別研究室是分不開的。剛才聽完幾位引言人的介紹，發現自己沒有活在他們講的歷史中，因為台灣同運和學院裡同志理論的發展黃金 10 年我都不在台灣，我是近年才回到台灣來的，但是剛才聽的時候有種奇怪的感覺，因為你們在講的其實都是我一直在思考的東西。我想回應一下多多和阿哲講的話。多多提到在一些很奇怪的場合有機會和一些不一樣的團體接觸，像是在反就業歧視法的場合遇到兒少團體、勵馨基金會，但是我看到這些團體的名稱時不但不會很開心，其實有點憂心，會覺得同志性別平權的意識可能會因此被收編，使這些極端保守的團體能進一步去進行教化或馴服，就是在平等化的過程中排除一些更邊緣化的性實踐。如果運動要向下紮根，對同志進行教育的工作，這也許是要提醒運動者的。第二個就是阿哲提到轟趴、污名、和同志的連結，這也是我的研究一直在處理的對象，我比較早期的研究是有關同志歷史、文化、政治這方面，在我的研究中，同志的污名跟性都有關係，是透過國家對於色情、對於風化的管制。近幾年來同志團體跟一些弱勢團體的串連和相挺，譬如說公娼事件，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對於對抗性的道德和污名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有機會，也想聽到大陸那邊對於賣淫和同志的看法，例如台北的 AG 事件就是因為警察懷疑三溫暖裡面有色情交易所以去臨檢，現在的網路援交也是因為交易這兩個字。性交易除罪，不管是對愛滋防治或是同志平權來說，都是相當重要的。

何春蕤：甯應斌說他放棄說話權，以便開放一些時間讓大家問問題或回應。

雷剛：我們聊的很多內容其實只停留在當代，有的東西還缺少機緣和土壤，所以成都或者是大陸在同志運動這一塊要想更快發展的話，有可能都是 10 年 20 年之後的事情了。基礎的土壤並不多，我們得花更多的時間去培育人才，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把目標放在 10 年 20 年後。

李佳霖：我主要是想要問王蘋，你剛才講接下來的展望是做同志運動的亞際連結，尤其是靠近台灣周邊的國家，在連結的過程中去挑戰或衝撞，得到新的火花。想請問當初你會有這樣的理念，只是因為地理環境近嗎？為什麼

不是想跟西方同志運動這一塊合在一起？第二個問題是，我昨天看了最近的新聞，應該是 10 月份，在新加坡的法律裡，同志不管是公開或是私下都是違法的，想問一下你的看法是什麼。

王 蘋：亞際的部分其實前年我們辦過一個亞洲拉子影展，很嚴肅地寫了一大篇文章，有空可以參考亞洲拉子影展的專刊。不過我還是概述一下亞際的重要性，在台灣你要看到同志影片一直不是很困難，比如說早期我們從「費城」看起，好萊塢的片子都有，都是西方的觀點，同志在世界各地都可以看到同志影片，但都是西方那種特定文化、政治、經濟底下比較在高位的影片。這當然是個問題，可是我們從來都不覺得那是個問題，因為當你什麼都沒有的時候，那真的很棒，你要辦拉子影展，要找片子，能夠找到的大概也都是西方來的。我們就會想，離我們很近的地方的影片在哪裡？第一就是資源非常少，大多數的影片都集中在有錢的地方，不是說他們有錢拍電影，而是整個社會的能力能不能支撐出一個拍片的資源。鄰近的亞洲地區資源非常少，我們辦的是女同志影展，資源又更少。然後我們又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其實不是沒有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的女同志拍出好的女同志影片，而是當他們拍出來，就會送到柏林、舊金山去參加同志影展，而不是在當地放映。不是她們不要，而是她們存活的機會，因為一個影片拍攝很困難，如果能夠拿到世界看得見的市場上被別人看見，才有可能獲得資源繼續拍下去，這是他們養活自己的一個方式，可是也就形成為什麼你能夠看到的影片都是西方的，而且這些亞洲地區的影片也只有在西方看得到。我們在搜尋影片的時候發現，你在美國可以看到世界各地甚至很小地方拍攝的影片，可是你在當地是沒辦法看見的。我們覺得這是件重要的事情，我們更應該要讓彼此的資源能夠交換，所以在有限的資源下邀請亞洲各地的拍片者，然後有些人的片子在自己的國家還不能放，第一次放映就在台灣。當然相對而言，台灣也是資源多一點點的地方。

另一個問題有關新加坡的雞姦法。這樣的刑罰在世界各地都是有的，針對的是口交和肛交。新加坡針對異性戀之間的口交和肛交已經合法化、去刑罰化，看起來似乎在性權運動上有一點點解放，因為在這一類的性行為上終於有了去刑罰化的可能，但是對同志之間的口交和肛交依然是有刑罰的。新加坡總理表示，要顧及新加坡社會裡傳統的家庭價值，所以必須維持這樣的刑罰。其實這也沒什麼道理，可能就是一般的家庭裡面必須進行這樣的性行為，你不讓它合法化，家庭會崩解，這是我唯一想到的一件事，倒不是什麼迫害不迫害。全世界各地都在進行這樣的去刑罰化的抗爭，鄰近的香港就是，因為他們以前是英國的殖民地，在英國早就去刑罰化了，但是香港也是到前年才解除對同志行為的刑罰。你問我的立場，我們當然是反對，所以我們就在報紙上聲明我們強力譴責。

趙 珂：我想回答一下黃老師剛才提的問題，但我了解的可能不是那麼專業。現在在大陸，對於同性之間，不管是因為身分還是性行為，會被法律處罰的只有以下幾種情形。一種是三個人以上在公開場合進行性行為，會犯聚眾淫亂罪；另一個就是性交易。剛才黃老師提的問題是，政府是否通過性交易這個管道來管制同性戀，我覺得不是這樣說，而是他只有這個管道可以管到同性戀。然後是關於性工作者的處境，首先法律明文規定禁止性交易，所以性工作者遭受打擊。但隨著近年愛滋病問題嚴重，政府官員發現

在性工作者中開展愛滋病健康教育的重要性，現在公安系統和衛生系統總是處在一種對抗和合作之中，一方面衛生系統說我們要發安全套、做健康教育、預防愛滋病，但公安系統說不行，我們也有我們的任務。那就是看這兩個系統的協調，從全國到地方都不一樣，有的地方衛生系統和公安系統交流得比較好，會形成一些默契，在什麼情況下視而不見，有的地方這兩個系統關係不好就衝突比較嚴重。但總體上來看，全國衛生系統已經達成共識，也有越來越多公安系統的人認識到這個問題，而同志的問題發展相對比較晚。

張永靖：我想要問兩個比較技術面的問題。第一想要問趙珂，你剛才說你們組織不只在北京，也會支持一些其他省分的組織，想問你們是用什麼方式串連的。第二是關於台灣的，我想知道台灣同志團體裡面年齡差異的問題，運動者和社群之間存在的年齡差距，不同年齡層也會有不同訴求，想知道你們怎麼看待這個問題。

趙 珂：其實在中國，我們每年各種會議非常的多，同志組織串連起來還真的不是那麼麻煩，本來就是個網路時代，大家都會知道在這個省有哪些同志網站，然後在這個省有哪些同志名人。現在大陸有大量資金湧入在同志與愛滋病防治上面，每個省份的活躍份子都想要站出來分一杯羹，要串連起來是非常容易的。我們愛知行研究所在資源方面擁有一些優勢，相對而言，我們每年拿到的錢在中國地區算是多的，但是我們不僅僅只做北京的事情，我們需要做全國的事。但是不可能工作人員到那個省份去調查當地的情況，所以我們會透過各種會議交流來看有哪些組織比較符合我們的理念，我們每年遞交資金申請的時候就會把他們的資金涵蓋在我們裡面。還有我們也支持全國各地愛滋感染者的組織，在中國大陸賣血的問題相當嚴重，有整個村子都因輸血感染愛滋，但他們既貧窮又飽受疾病之苦，要活下去就必須自己救自己，他們會慢慢形成感染者自救組織，一被外界知道後就競相學習，所以全國遍佈著很多感染者自救組織。同樣，國際資金到了中國就要分散出去，也慢慢會有培訓的計畫，因為他們不知道怎麼樣做一個 NGO 的機構，很多國際組織和項目都會培養一些人來工作，透過這些培訓班來接觸他們，同樣根據一些個人能力、情況、以及理念是否合適來決定輔助。

何春蕤：很多世界組織和 NGO 其實對於中國的關注和經濟的投注是很大很大的，因為他們很清楚，要進入中國產生某種影響力，這是一個很快的捷徑。所以你會發現這些組織對於台灣這片土地就不太管，因為在中國大陸比較能操作的層面在於 NGO 這個層面，所以也多從這個管道進入。

王 蘋：有關運動是否有代間差距的問題，重點是組織運動者和群眾之間的年齡差異，還是在組織的工作裡有些年齡層的議題是被忽略的？比如說我們沒看到青少年議題、沒看到老年議題，代間差距是必然存在的，可是有時候差距並不一定來自年齡的差距，想法的某種僵化有時候跟年紀無關。你可能看到一個年紀很大的人思想非常前進，可以跨越世代，但是很可能剛剛才冒出頭的一些小 T 小 gay 們已經有很僵化的想像，把未來人生路都已經鋪陳好了。如果是講組織者內部，確實有些問題會沒辦法，你在哪個位置上就會傾向於思考到哪個層次的問題，比如說想做青少年同志這一塊，想進入高中校園，但這不是那麼容易，台灣本來就少一塊青少年運動，本

來那個聲音就弱，所以我們才會看到排山倒海而來的兒少運動裡，父母都是兒少的代言人，認為要保護兒少所以站出來。過去在和這些保守團體對抗時，我們也意識到很大一塊是缺少兒少主體的聲音，放在同志運動裡面也類似，可是現在也有一個自詡為青少年性權捍衛的團體已經成立，他們在組織自己的過程中已經長大，不再是青少年，但是他們努力做青少年的工作，這是有被看見的。然後隨著我們自己年齡增長，接近要被關懷的那個老年年齡層，老年同志的部分過去不是個很具體的工作項目，但我相信這一定會變成被關切的部分。

甯應斌：我打個岔，過去十幾年來常聽到有些青少年要反對髮禁或者其他議題，但他們那時候差不多是高三下，半年過去後就變成大學生，然後就變成好像不是青少年主體，所以青少年的運動是很困難的。最近竄出來的台少盟就是那種由父母站出來代言的團體，他們也有青少年主體嗎？

多多：他們其實作了很多工作是跟青少年接觸，比較有趣的是他們會到校園裡鼓勵青少年到處塗鴉。

甯應斌：這和之前勵馨基金會要籌組的青少年聯盟有關嗎？

多多：就是那個東西，可是工作人員和青少年接觸之後也有一些不太一樣的改变。

甯應斌：這是個比較有趣的趨勢，當然這是公民社會全球發展的趨勢。比較大比較有資源的團體可以做這種事情，所以以後勵馨基金會如果要辦一個同志團體，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這種情形在大陸更可能出現，台灣比較小，大陸比較分散，運動的可能異質性相當值得關注。

何春蕤：其實很可能的一個發展是出埃及協會發展出同志組織協助同志悔改，這是未來可能的發展。大家不要把同志運動的發展太統一化，其實有很多其他的可能。

王蘋：我回應小卡提的東西，我真的覺得台灣沒有小孩主體，連運動內部也沒有。我自己有深刻的感受，比如說我們參與一些組織，很快會聽到跟我們一起工作的年輕夥伴突然就會說，我們是小孩，你們大人才能做決定。碰到一些困難問題，他們會說，我們都是小孩，你們大人不在，所以問題沒有辦法解決，你們出來就搞定。我會覺得，為什麼你們是小孩？你們都可以做決定啊，如果犯錯，你就承認，你就學習了。當時髮禁問題一出來，是有中學生權益促進會出頭的，他們相當有主體性，可是一旦連結到在學校裡抗爭，你就發現他們是跟人本基金會結合的，總部就會在台北縣某個地方人本的辦事處，這樣就會有些奧援。小孩沒資源，要辦街頭運動，街頭運動就要借舞台、借車子、借麥克風，大人就出現了，因為大人有資源，小孩什麼都沒有。不知道是雞生蛋，還是蛋生雞，小孩沒資源就沒主體性嗎？這會是運動一直需要突破的一些東西。

趙珂：何老師提到宗教團體搞同志議題，之前在北京就有個教會組織要辦同志活動，我們就馬上報名要潛入那個會議，或是在他們那個會的對面就開個我們的會，對著他來講我們的東西。結果後來它也沒辦成，不知道為什麼。

王蘋：我想問兩個問題，剛才提到中國大陸的資金來自於對愛滋防治的資金投注，直接是做同志和愛滋的關係，目標當然是男同志，所以我知道有些愛滋團體當中自動會有男同志的工作項目。問題是，女同志組織的資源要怎麼來？在同志運動的發展上，如果男同志可以藉由愛滋項目得到資金，女同志組織的資金要從哪來？另一個問題今天沒提到，但我覺得還蠻值得思考，就是婚姻和同性戀的關係，同性戀不能結婚，所以我不是講同志婚姻而是異性戀婚姻，社會上沒有出櫃的同志都面對異性戀婚姻的壓力，這點在台灣其實也還沒完全解決，特別如果是家裡的獨子，男性的壓力可能更大一些，家裡會要求很多，比如叫你結婚之類的。在過去和大陸交流的經驗裡發現，這個也依然是要討論的議題，我想聽聽大家如何思考不同社會體制下所面對同樣的問題。

喀飛：一樣是要問大陸的朋友，其實延續剛剛世代差異的問題，我想問的問題是你們在自己的組織裡，你們的年紀是屬於什麼樣的狀況，或是你們覺得自己做的事情和同年紀的人有什麼不一樣？

丁乃非：我比較想問的是你們跟一些婦女團體像是婦聯或是學校裡的婦女團體，有沒有什麼關係？

想起：我想先回應丁老師的問題。婦女團體 1998 年在北京曾經召開一次國際婦女大會，當時有個女同志組織，北京熱線，想參加那個婦女聯合大會，但是被拒絕了。據我的了解，在大陸女同志和婦女團體沒有什麼聯繫。我之前也和朋友聊過這些話題，我們都覺得特別是上海的婦聯，如果去跟她們聯繫的話，她們會覺得很奇怪，所以基本上沒什麼聯繫。但上海有一些女權主義的研究學者，還有上海復旦大學的孫中興教授，他之前是研究女權主義的，也很關注女同志文化。上海復旦大學也有辦過同性戀課程，也邀請我們一起參加。

趙珂：我們機構倒是跟婦女團體有些聯繫，可能連繫不到婦聯那麼官辦、國家的組織，但是我們跟民間的婦女團體有些合作。我們有個項目已經開展了兩三年，叫做反家暴，就是反對性別暴力的項目。關於女同志資金的問題，在目前的狀況下，要拿到愛滋病的錢非常容易，要拿到同志的錢非常難，至少在國內只有愛滋病的經費，沒有同志的。所有跟同志有關的議題只能從同志人權機構獲得，或是靠出國開會推銷自己，獲得一些經費，但也不那麼容易。我們單位就會從愛滋這筆錢裡一直擠來做同志權益的部分。

想起：我想補充一點，有些雲南、成都的女同志小組會加入男同志的組織，男同志會比較關心女同志，所以會盡量撥一些錢給女同志做些事情。

雷剛：經費的事情基本上解決了。最近幾天跟想起也聊很多，我們都在不同的城市，以前其實沒有見面的機會，只透過網路有些連絡，經費除了從外部得到，我們也在聊怎麼從社群內部找資源，這點也是蠻重要的。關於婚姻這一塊，這幾天也不斷被問起，總的來說，大陸結婚的比率還是很高，但是逐年在下降，這是我所了解到的情況。如果以 1960 年代出生為一個界線的話，1960 到 1990 年代出生的人，自我認同和對婚姻的看法都是呈 10 年一個變化，1960 年代以前出生的人結婚比率非常高，只有少數人會不結婚，1970 年代像我周圍不結婚的人就比較多了，1980 年代不結婚的比率更

高，1990年代現在在初中就可以跟班上同學說自己是同志，然後關係還處得比較好。當然這也許是個案，也會有出櫃以後遭到歧視的例子，甚至會發生連鎖反應。婚姻的層面上來講，會越來越接近華人社會平均的比率，但還需要時間。至於年齡在機構裡的情況，我的年齡在我們機構算大的，我們的志願者幾乎都是18到25歲居多，（眾：好年輕喔~），當然這是因為我們有百分之75的志願者是大學生，我們本身也是鎖定這個群體為我們培育的方向。然後有件很有趣的事情，在大陸我們把公益機構分為兩種，一種叫GONGO，一種叫草根。GONGO的意思是政府下面的團體，以前是政府部門的一個系統，現在轉型出來，不能算公務員了，在轉型過程中有些地方走得快一點，就會接受新的東西，像剛才趙珂講到的紅楓，我們就有接觸，那是在北京，我們在西部也會跟一些GONGO接觸，一起參加培訓、提升能力，這是轉型比較快的。但目前為止大部份機構還是轉型比較慢，反應能力比較差，所以我們一般對於GONGO是很不屑的，它們實力很強，可是比起草根來說，做的事情很少。但GONGO在某些方面還是發揮自身優勢，比方說可以拿到資金，草根就拿不到，這是比較大的問題。所以我們會努力跟其他團體搭線，包括在四川的婦女團體，但因為它們是GONGO，還沒反應、調整過來，所以我們比較希望在大學裡找到能一起從事的夥伴。

范坡坡：我可以談的是年齡的問題。大陸現在很多問題都出現所謂基齡化的問題，就是大家覺得年紀比較小的人做出來的是比較新鮮，大家都說你22歲就出書真了不起，但對於我來說，有很多1990年代的人也在出書，這並不那麼稀奇。我還能列舉一些在我身旁的人，有一個北京17歲的學生，他做了一個同性戀廣播在校園裡面播出，後來學校就說你還是不要做這個比較好，但他熱情相當高，在很多場合都能看見他。以前還遇到一個上海交通大學電影藝術系的拍同性戀的片子，家裡挺有錢，全都是自己投資。反正現在好像就存在這樣一個現象，但是我覺得去很多場合都是學生跟我們一起參與活動，包括我們辦電影節、弄放映、開會什麼的。好像年齡大的人都忙著賺錢工作，退休之後不敢出櫃、不敢走出來，所以只是學生在參加也並不是好事情。如果一個國家發展得好，各個年齡的人都應該要參與工作，如果是一個基齡化的情形，那代表發展還不夠充分。我也覺得有些年齡較大的人挺慘的，我們那時候辦個青年論壇，就有個40多歲的人，感覺格格不入，他又特別愛發言，特別愛說話，大家好像都對他有點厭嫌。對我而言，在我所處的團體裡面好像都是一些比我大的長輩，因此如果是耗體力的問題，我都會積極去做，但如果是決策性的問題，我還是會問問別人的意見。

趙珂：我可能對年齡的問題有個自己的解讀。我在我們機構算是資歷非常老的人。我的解讀是，我們這一代正好反映了這個時候，開放的程度剛好達到，又恰好遇到愛滋病問題，資金的投入，所以我們這一代的人就有這樣的機會正好趕上這個事情，年輕就會覺得做這些事情特別興奮、有成就感。現在看來，做運動的人還是以1975年到1988年這個年代為主。

何春蕤：好，充滿了希望。我們今天談了那麼久，花了那麼多時間，但我相信一定還有人有話想講，我們可以轉移陣地，下一階段的討論可以到性／別比較悠閒比較自在的地方。無論你是老gay也好，小gay也好，都可以比

較自在地溝通。我們今天特別謝謝遠道而來的朋友，還有台北來的朋友，謝謝大家的光臨和參與。